

李凯 著

封面题字 任彤

出土文献与商周文明初探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SKXJS 2015006）支持出版

出土文献 与 商周文明初探

李凯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土文献与商周文明初探 / 李凯著. -- 2 版.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3

ISBN 978-7-5596-0781-2

I. ①出… II. ①李… III. ①商周文化 (考古学) IV. ① 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0795 号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出土文献与商周文明初探

作 者: 李 凯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责任编辑: 唐乃馨 宋延涛

装帧设计: 联合书庄 bjlhcb@sina.co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5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印张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781-2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序

20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地不爱宝。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给学术研究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机会。考古材料的价值，正如大学者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盘点中国学术史，每一次出土文献的大发现，都带来学术的大突破。

如西汉孔壁书，用蝌蚪文写成，《尚书》系其重要内容，隶定整理之后，引发了汉代声势浩大的今古文之争。另如西晋时期河南汲县出土的汲冢书，盗墓贼不准点燃竹简做火把，后来将其随意丢弃，被当地官员发现，方知该墓为战国魏王大墓，其中竹简书《纪年》为魏国史书，其内容上溯到夏商，为矫正《史记》的编年记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到 20 世纪初，甲骨卜辞、魏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文献、西域少数民族及外国文字，出土文献异彩纷呈，已然洋洋大观。最近二三十年的新发现更是令学者们目不暇接，仅上古史领域，甲骨金文简帛文献就如同雪片一般。

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方兴未艾，这不仅弥补了学术界诸多空白领域，而且带来大量的新问题。专家们都认识到，有一点格外重要，就是出土文献无疑是为历史学的研究服务的。不少学者指出，其实人们聚焦的考





古学，从学科体系划分以及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广义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按照历史主义的原则，古代生活的种种遗存，定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海平面上的某个波澜，也许就是大海深处暗流涌动的结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土文献就失去了沧桑感，会变成行尸走肉。那么出土文献研究的落足之处，也应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展现古代制度的变迁与古代生活的面貌。这样的话才能凸显出土文献的重要意义，发挥历史学的史鉴功能，出土文献的研究才有以小见大的气魄，经得起推敲，不流于零碎的短钉材料。

历史学是冷板凳，而先秦史又是冷板凳之中的硬骨头。李凯同志本科到博士后十几年皆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这一学术重镇中度过。他三十而立，方富于年，对先秦史有兴趣，随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来，肯下功夫蹲书斋，做文章，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值得鼓励。这本书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从学生，到中学老师，又到博士后，经过历练积累，学识和研究水平皆大有进步。虽然这个领域未开掘的地方还有不少，但这部书对于李凯同志的学术研究确是一个很好的阶段性检阅和总结。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领导的大力协助，玉成此事，让我们格外铭感。李凯同志才思敏捷，精力旺盛，勤于思考和钻研，相信他会有更大的成绩贡献给大家。

是为序。

晁福林

2014年11月29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前 言

商周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阶段，其研究意义自不必言，难度也可想而知。

先秦史的研究工作最大的难题，莫过于材料太少而疑问太多。孔子就感慨于典籍资料和熟悉夏礼与殷礼的人不足，这一话题随着礼坏乐崩以及历次文献浩劫愈演愈烈。近代罗王以来，一大批学者以新材料为基础引领整个学科发展，重新书写中国上古史，百余年来，历尽艰辛也不绝如线。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李学勤等先驱，不仅是第一批见到并整理新材料的人，而且以新材料开风气，影响先秦史诸多领域复杂问题的深入探索。细绎其中规矩，不难发现，前辈专家对新材料的开创性，不在于在出土文献上标新立异，而是因为他们对典籍文献无比谙熟，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好地吃透这些材料，为古史的研究服务。或者说，这些大家借助甲骨学、金文学、简帛学的知识，开拓了历史学的新空间或者解决了历史学的大问题。清代乾嘉以来的学术成果，在新材料面前，即便是旧瓶也能装新酒，视野焕然一新。但即便地不爱宝，出土文献汗牛充栋，这些资料也是沧海一粟，我们仍然有大量的问题停留在头脑中，百思不得其解。圣人云，多问阙疑，慎言其余，仍旧是无比高明的做法。





由于材料捉襟见肘，所以历史画面感不可能像后代那样鲜活。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视野就很不一样，人家真正由材料支撑起的研究是极其鲜活的，而这种鲜活感，在先秦史领域的论文中非常罕见。也有人说，中国古代史的学科生态是死而不僵的烇钉材料，先秦史尤甚。这话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实。王锺翰先生的《陈寅恪先生杂忆》记载，陈寅恪先生明言：“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①确是如此。如果说它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就是死而不僵的话，先秦史学科就是先天如此。但是死而不僵毕竟没死，我们可以让它尽可能鲜活一些。所以这一领域更要仔细消化已有的各种文献，以期获得更多的时代背景知识并形成系统。这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脑补”就格外重要，已有文献吃得越透，越能有说话的空间和底气，形成的认识就越真实。进而面对新材料能掰开揉碎，从深入历史画面中揣度此材料的意图功用。原先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只能期待随着出土材料和文献知识的丰富，也许会有个大致的轮廓或者思考方向，从而弥补鲜活感的缺陷。但谁又敢说，人们“脑补”的轮廓或者思考方向，一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呢？

孤证和默证也的确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出土文献的确耳目一新，但它提供给我们的很可能就是特定历史场景中的单一个案。既然如此，这样的文本就完全可能适用于不同的解释，并且相当多的情况是学者仅在

^① 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自己的逻辑体系中自圆其说，但很难排除其他角度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孤证带来的麻烦。也正是因为出土文献是个案，即便说能够串联起证据链，要凭借这样的证据链证实或者证伪某些问题，仍不免心存默证的疑虑，当时文献无当时某事实的称述，就一定无此事实？恐怕未必。因为古代社会好多层面未必比今天社会简单到哪里去，保不齐万里有一，人们建构出来的证据链也许是冰山一角。毕竟说有易，说无难。

此外，隶定训诂断句的分歧，使得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见仁见智；机械使用二重证据法会削足适履，方凿圆枘；对历史背景知识的联系，也可能是牵强附会；对商周变革或者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意义的理解，也许来自于“自其大者观之”或“自其小者观之”的不同视角。这一切都使得先秦社会面貌的探索工作，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先秦史研究独特的痕迹（或者说后代历史也有，但比先秦史是小巫见大巫），也意味着它有着其他历史阶段不可企及的神秘感与开放性。一方面，学者们不得不吃透任何触手可及的资料，并且还要考虑到更多角度解读的可能性。如果说人家的有效信息是俯拾即是，这里却需要掘地三尺。另外一方面，则需要学者脑洞大开，没有开放的思路，文章的创新性就无从谈起，而这的确要仰仗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严谨的逻辑，虽然不具备材料数量上的优势，但有前辈专家的榜样在前，如果足够努力且方法得当，也是可以凭借对材料的谙熟和深刻理解做出新的学问。给各位读者奉上的这些小文，基本上都是立足于出土文献试图以小见大的文章，写成之后，也非常忐忑。一是固然前辈们提倡窄而深、以小见大的文章，但“深”和“大”不应该过头，史料须支持得住，诚如半斤米做不了满



汉全席。二是一旦论题和历史背景相挂钩，那么就要求其中的联系必须坐实，不应是附会，但笔者往往不安于此。如果这两点做不好，则就超越了逻辑规矩的界限，成为过度解读、无根之木，自然不能服人。《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何晏德高望重，一时间去他那里清谈的宾客济济一堂。而王弼当时不满二十岁，也去拜谒何晏。何晏闻王弼之名，试图考他，就把刚才仔细辩论的玄理告诉他，问“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王弼马上进行驳难，满座的人都理屈词穷。随即王弼又自为主客，几度自问自答，“皆一座所不及”。当时没有一位高士把这次重要的清谈论难详细记录下来，精彩之余甚为憾事。但今天笔者能在各位读者的指教下打磨前进，一定是收益良多的事情，诚祈请方家赐正。

目 录

第一篇 出土文献与先秦史事管窥	001
《豳公盨》再笺——兼谈对益启传说的再认识	004
《尚书·汤誓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陟”新证	032
周昭王死于地震说	045
先秦秦汉文献有关周穆王西巡之事辨析	056
从《士山盨》看西周中期的南方经营	064
《五年师旋簋》蠡测	076
《柞伯鼎》蠡测	090
《史密簋》铭文相关地理历史问题	099
芮国史证	117
第二篇 出土文献与商周制度钩沉	129
《作册般鬲》与晚商射礼	133
从《何簋》看西周军事制度	147
《肃卣》之“仆”与西周军事制度	156
《季姬方尊》铭文与西周宗族经济	166





说《文盨》之“率道于小南”	177
史籀改制考论	189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202
商西周时代史的文武双重身份——兼论战国以前文武无分职 ..	211
“觚不觚”再释	225
第三篇 出土文献与三代信仰考析	231
从清华简《尹至》看上古祝诅巫术	234
说清华简《程寤》“攻于商神”	249
从《简大王泊旱》看《河伯》的“祭不越望”问题	259
清华简《楚居》与“江、汉、睢、漳，楚之望也”	274
试论秦巡狩封禅礼的宗教意义	286
《史记·秦始皇本纪》“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试解	296
本书甲骨金文著录简称表	309
后 记	310

第一篇

出土文献与先秦史事管窥



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五帝时代的结束与一场在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密不可分。与西方诺亚方舟神话迥异的是，中国先民并没有求助于上帝挽救灾难，而是自力更生。来自有崇氏的禹肩负起治水的使命，调集民力，不仅治水成功，而且获得了超过尧舜的权力和威望，最终受禅成为联盟首领。大禹去世后，他的儿子启得到四方首领们的拥戴，继承大位，开创了日后四千年“家天下”的王朝传统。夏王朝共历四百多年。这样的历史是真有，还是后代的层垒？如果是传说中演绎夹杂史影，那么演绎和史影各占几何？孰是孰非？自从古史辨派兴起，争论就不绝于耳。幸有青铜器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大白天日，我们能够看到西周中晚期贵族眼中的夏代历史观，也能凭借西周时代的社会背景推测出夏代史影的蛛丝马迹。

夏国祚四百年，作为早期国家的王朝来说亦不可谓短。太康失国，少康复国，在夷夏斗争融合中延续禹祀，直到桀的统治时期，夏朝被子姓商族的首领成汤所灭，共历十四世十七王。商族是一支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古老部族，从始祖契相传辅佐大禹治水而受封于商，一直到主癸，共历十四代先公。根据考古发现，晋冀交界一线的下七垣文化应为先商时期的殷人文化，表明殷人可能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进入中原，夏商之间的瓜葛如何，商族灭夏过程中采取了怎样的手段，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灭夏之后，殷都五迁，先后

有亳、囂、相、邢、奄等，原因众说纷纭。从商汤到帝辛，建立在众邦基础上的商王朝为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享国约六百年。

代殷商而有天下的周人同样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始祖弃相传为大舜时期的后稷之官，主管农事。公刘时迁徙至豳，重操农业，之后经过九世到古公亶父时，迁徙至周原，如绵绵瓜瓞，发展壮大，到周文王时期，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到武王时期，周人在牧野一战克商，蕞尔小邦建立西周王朝。此后，周人平三监，征东夷，营洛邑，封邦国，建官制，作礼乐，不仅使得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而且凭借其制度文化周天子不再是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在分封制度下蛮夷戎狄和华夏聚居融合，礼乐文化随着周人的政治轨迹波及到了旷阔的社会空间中。历经成康之治、昭王南征、穆王巡狩、国人暴动、宣王中兴，至幽王亡国，除去中间十三年的共和行政，共历十二王，约三百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国都于洛邑，建立东周王朝，为戈矛纵横、纷披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拉开了序幕。但令人遗憾的是，西周时代典籍传世者仅有《尚书》若干诰辞，以及《诗》中的零星篇目，大量西周史的历史场景需要金文来填补。幸好周人有将祖先功业铸之盘盂的习惯，这样周王如何君临天下经营四方，臣子如何执行君命，国家机器如何发挥作用，周人和蛮夷戎狄在广阔的地理环境中发生过怎样的关系，周人对封国与蛮夷戎狄的统治策略是温和还是强硬，商周之时一批纷乱复杂的地名该如何落实，这些场景随着为祖先歌功颂德的铭文一道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出土文献也给史籍中昭王南征，穆王巡狩天下，夷王烹齐哀公于鼎等语焉不详的大事件带来新的视角，使得人们对分封制度下周王朝各阶层的政治关系的认识愈发丰满起来。



《豳公盥》再笺 ——兼谈对益启传说的再认识



《豳公盥》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保利博物馆藏《豳公盨》是近年所获重要的西周青铜器。《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2003年第4期,《华学》第六辑,《考古》2003年第5期分别发表李学勤、裘锡圭、朱凤瀚、李零、连劭名、饶宗颐、周凤五、罗琨、沈建华、张永山、江林昌、冯时等学者对《豳公盨》铭文的考证、时代的推测与其学术价值相关论述;2003年3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专门召开《豳公盨》的学术讨论会,刘雨、邢文等中外学者从多角度进行了考证讨论,《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三卷第二至六期刊载了会议的论文。诸家给予《豳公盨》很大的关注,但一些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本文提供了一些文字新的解读,并将铭文分作各自中心明确的三大段。这样《豳公盨》不仅对夏禹,同样对伯益的研究意义重大,这是众多研究者所未及注意到的,请方家斧正。

一

铭文十行凡九十八字,前九行每行十字,后一行八字。下为隶定:

天令禹敷土,随山濬川。迺拂方执征,降民监德。迺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乍臣。毕显唯德,民好明德,夏才天下,用厥邵好。益奸懿德,康亡不懋。孝友恤明,丕齐好祀无咎。心好德闻,遵亦唯协。天釐用考,申复用福禄,永御于盨。夔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悔。”

《豳公盨》语境不清,文例迥异于两周青铜器祭祀、册命、战功、约集等常见格式,其中有相当多的冷僻字出现。诸多学者的解读卓有见地,但许多问题还有待商榷。诚如诸家指出,释读这篇铭文的关键,既在于冷僻字的解释,更仰仗于主语的寻求。笔者读《豳公盨》,分为首、次、末三大段,下面,依三段之分,再逐段逐字逐句予以推敲。



（一）首段

首段从“天命禹敷土”到“用厥绍好”，共四十八字，分为四大句、十一小句。简读于下：

“天令（命）禹敷土，随山濬川。”

前小句是“定语 + 主语 + 谓语 + 宾语”的句式，主语是受天之命的大禹。“𡗗”，《说文》“布也”。诸家按照《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词例推勘，将“𡗗”训为“敷”，意思是“分”。

后小句为禹的行为。诸家训“𡗗”为“随”，按照《尚书·禹贡》词例推勘，意为破坏。“濬”，即“浚”，《说文》言：“浚，深通川也”，裘锡圭先生有考。

第一大句说大禹治水之功，在建夏之前。

“迺拂方執征，降民监德。”

“迺”起到承接的作用，衔接“拂方執征”的并列结构，表明此句的主语仍然是禹。

“拂”是诸家有很大分歧的关键字。李学勤先生训为“差”^①；裘锡圭先生训为“畴”^②；朱凤瀚先生训“奏”^③；李零先生认为是“拜”的别字^④；连劭名先生亦读为“拜”，读为辨^⑤；刘雨亦读为“差”^⑥。“𡗗”所从的“𡗗”在铭文中不乏其例，已经有学者撰文详细考证，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轨迹：“𡗗”——“𡗗”——“𡗗”——“𡗗”——“𡗗”——“𡗗”——

① 李学勤：《论夔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② 裘锡圭：《夔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③ 朱凤瀚：《夔公盨铭文初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④ 李零：《论夔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⑤ 连劭名：《夔公盨铭文考述》，《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

⑥ 刘雨：《幽公考》，邢文主编《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三卷第二至六期专刊，2003年12月。